

# “培育一种文化生活”：郭秉文时期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校园文化之形态及育人影响

□ 李 力

**摘要：**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国立东南大学之所以能够在十三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极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发挥出显著的育人影响，并培养出一大批卓越人才，与校长郭秉文着眼于育人、注重在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培育一种文化生活”密不可分。他注重从营造优美中正的校园文化入手来陶冶和熏陶学生，注重基于重构学生生活方式来发展学生之健全人格和独立个性。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校园文化是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师生所创造的物质环境、精神产品和生活方式。以校园价值观为内核的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灵魂。基于师生合作的学生自治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载体。郭秉文始终站在培育适应民主社会生活的理想公民、构筑崇尚研究高深学术的大学文化与精神氛围，以及大学引领与示范社会前行的高度来思考与定位校园文化在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办学实践中的地位。

**关键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校园文化；学生生活；育人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5)04-0080-08

**收稿日期：**2015-02-04

**基金项目：**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近代大学校园文化之形态与功能研究：基于人才培养与大学发展的分析”（12YJC880041）。

**作者简介：**李力（1982-），男，陕西西乡人，教育学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历史研究。

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在这本旨在“使一般教育者了解中国近代教育史实及现况”，“在内容上注重于各问题之代表著作，在形式上注重于文字之优美”<sup>[1]（凡例p1）</sup>的教育著作中，舒新城特别选择由陶知行、邓萃英、陈东原、庄泽宣等二十一位教育名家，通过分别撰写从教育思潮到学制改革，从幼稚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女子教育到留学教育等十四个专题，详细梳理了现代中国教育的成长脉络和发展历程，以期完整呈现当时中国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基本现状与存在问题。

殊为巧合的是，曾于1923至1924年短暂担任国立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可以自称为“东大人”的舒新城，选择由另一个特殊的“东大人”来执笔撰写“中国之高等教育”专题。当舒新城正不遗余力地以东南大学附中为平台在国内竭力倡导道尔顿制的时候，这个特殊的“东南大学人”作为校长已经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积极践行自己的教育理想四年之久。他就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育学博士，1917年开始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代理校长，1920至1925年担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被后世誉为“东南大学之父”的郭秉文。

虽然当《中国新教育概况》正式出版时，郭秉文早已于三年前离任东南大学。但是由其执笔撰写的“中国之高等教育”却是1923年在东南大学校长任上所作，收录于郭秉文同年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一书中<sup>[2]（p70）</sup>。大概与其1925年卸任东南大学校长有关，此后便鲜见其专门针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文字问世。因此，这篇系统论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沿革的文章不仅可以视为作为教育研究者的郭秉文阐述中国高等教育的最后一篇学术文字，同时也完全可以视作身为大学校长的郭秉文反观自己多年从事高等教育的实践反思。

在这篇题为《中国之高等教育》的文章中，郭秉文分别从高等教育制度沿革、高等教育概况、外人经营之高等教育、女子高等教育、海外留学、学生

## 一、“课外作业，为学生自动的精神所表现”

1928年，舒新城主编的《中国新教育概况》由

之课外作业以及现在高等教育诸问题七个方面回顾与梳理了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与今后亟待正视的问题。在面临究竟应该选择哪些基本方面来如实反映与代表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态构成与发展走向时，郭秉文并没有单纯痴迷于诸如大学管理体制、大学精神与理念等易于引起学者研究兴趣的“宏大理论”课题。相反，他却把目光投射到“学生之课外作业”这一通常易于被研究者认为缺乏理论深度的“边缘”与“非主流”课题上，并且使用了不小的篇幅来予以阐释。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会对“学生之课外作业”青睐有加，将其视为介绍“中国之高等教育”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原因正是在于：“课外作业，为学生自动的精神所表现。无论在学问上，艺术上，体育上，皆应与学校课程同一注意，教育家宜尽量发展而指导之。”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当时普遍重视“学生之课外作业”，所以“学校生活，亦呈现自由活泼之象。”<sup>[1]</sup> (p117)

如果将郭秉文之于“学生之课外作业”的偏爱置于其掌校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办学实践中加以审视，可以发现，这种行为恰恰是其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的宝贵经验。正是由于郭秉文在掌校伊始就注重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园积极发展“学生之课外作业”以实现作育人材和大学发展，因此才会在文章中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与热情。那么，郭秉文心目中的“学生之课外作业”究竟由哪些要素构成呢？在《中国之高等教育》中，他将“学生之课外作业”分为学生自治、学艺组织、体育、社会服务和国事表示等五个方面逐一进行了讨论。其实这并非郭秉文首次专门述及“学生之课外作业”及其之于学生个体和高等学校发展的独特意义。早于1919年12月，他就在《战后欧美教育近况》一文中疾呼“培养学生自动的精神”理应成为中国亟需重视的教育问题：

共和国之实际，在学校内注重共和精神之培养，如教职员间之协力办事，学生方面提倡自治，发展自动之机会，养成互助之精神。或以为学生在今日，已极自动之能事，无提倡之必要。要知学生当此久静始动之际，容有出轨之处，将来具有经验，自能就范。<sup>①</sup>

事实证明，这种积极发展“学生之课外作业”以养成“学生自动的精神”，从根本上着眼于育人的学生生活方式的设计与构想，在历经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数年的办学实践检验后，不仅一致为当时的社会舆论与学校师生们所认同，而且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作为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继承者的国立中央大学的办学面貌与精神境界。

1924年，上海《学生》杂志社曾经发起组织过一次针对北京、天津、江苏、上海和广东五地十七所高等学校的校情调查，其中不乏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此次调查的一大特点就在于重点考察各校之学生生活和活动，进而对该校之整体特点做出评价。调查者在对东南大学学生生活进行评估后，给予东南大学高度评价：“校风淳朴质素，毫无嚣张气习”、“全校均富进取精神”、“全校均富合作精神”<sup>②</sup>。作为一所组建立仅四年的国立大学，能够得到如此上佳的评语实属难能可贵。而如果离开了作为校长的郭秉文苦心孤诣地通过发展“学生之课外作业”来培植“学生自动的精神”，着实很难想象调查者仅仅根据东南大学学子的校园生活就能够得出上述好评。

郭秉文所力倡的“学生之课外作业”也深刻地影响到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学子健全人格和独立个性的养成。1919年考入南京高师史地部、日后成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奠基者的张其昀，曾高度评价自己度过的学生生活：

南京高师师的学生自治会最有生气，课外研究又设有各种研究会，其目的在培养良好的公民资格，如公正无私，同情心，责任心，牺牲个人利益，尊重他人权利等事。从事政治活动而不根据于道德，则政治生活亦必致卑龌龊，令人有贱视之心。南京高师师学生个性有极度发展，然绝不因主张之同意，隐隐有局部之对垒。学生界党同伐异之败德，母校独无征迹，这也是当年学校生活最感愉快的一点<sup>[3]</sup>。

金耀基认为，完美的大学生活理应由“知性生活”与“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两部分构成。而在他看来，“创造性的文化生活”之于作育人材与大学发展的效用也许更为独特与深远：

① 郭秉文. 战后欧美教育近况[Z]. 新教育, 1919-12, 第2卷第4期.

② 佚名. 全国高等学校概况调查表[Z]. 学生, 1924-05-05, 第11卷第5号.

实际上,第一流的大学,特别是历史悠久的大学,无不有意无意地都在培育一种文化生活。……文化生活常决定大学的风格,常影响学生的气质品性。文化生活简单地讲就是生活得有文化。我这里所用的“文化”一词非文化人类学所指的文化,而是指一种有文学气质、有文生情调、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sup>[4]</sup>

无疑,郭秉文所推崇的“学生之课外作业”正是此种对于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学子具有“生命意义的生活方式”。从1917年以教务主任身份代替江谦行使南京高师校长职务,到1920年成为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再到1925年黯然离职,郭秉文作为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的舵手长达八年之久。期间,注重从营造优美中正的大学校园文化入手来陶冶和熏陶学生,注重基于学生生活方式之重构来引导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和独立个性之张扬,一直贯穿于郭秉文办学实践的始终。从本质上而言,郭秉文始终站在培育适应民主社会生活的理想公民、构筑崇尚研究高深学术的大学文化与精神氛围,以及大学引领与示范社会前行的高度来思考与定位“学生之课外作业”在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办学实践中的地位。可以说,“学生之课外作业”之所以会使得郭秉文念兹在兹,其实绝非其个人的办学偏好所致,也并非单纯地指导学生消遣课余生活的办学手段与管理方式。在他看来,“学生之课外作业”本质上是作为旨在培养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学子完美品性,深刻影响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学子心灵发育的校园文化而存在。

文化是一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sup>[5]</sup>。大学校园文化是大学师生所创造的物质环境、精神产品和生活方式,它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行为方式,师生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主体,以校园价值观为内核的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灵魂。从1914年南京高师成立到1927年国立东南大学被纳入合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在并不算长久的十三年办学历程中,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在顺利完成从新学旧学杂糅的师范学堂向文理学科并存的现代综合大学转型的同时,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杰出人才,树立了其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

的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以校长郭秉文主政时期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校园文化的表现形态为考察中心,着重阐释其形态之构成与特点,进而论述其独特的育人影响。

## 二、“历史背景尤为大学无价之宝”

作为大学存在的物质基础,理想校址的选择往往令办学者煞费苦心:作为物理空间,它不仅能够满足破土动工、大兴土木的建筑要求,从而使得学习生活其中的师生日常生活要求能够得以满足;作为“文化空间”,它最好还拥有优良的校园景观,或是自然风光旖旎,使得生活其内的师生能够终日目睹美景,赏心悦目;或是历史底蕴深厚,能够成为大学接续历史与人文传统的中介与津梁,从而对学子的健全人格和优良性情进行熏陶与陶冶。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无疑正是坐拥此种理想校址的代表。

1929年11月1日出版的《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的扉页上印着一帧照片,整个照片的主体只有一棵高大的松树。这棵其貌不扬的松树就是被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师生无比珍视的六朝松<sup>①</sup>。1924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日后成为著名文史学家的陈训慈曾这样形容六朝松:“现在东南大学还矜夸着他校园里有一枝‘六朝松’,这枝松是否真起于梁朝,却也须费一番考证,或者是因梁代国学建于这里而起的传说,也未可知。但是通常终不曾措念到这里曾有梁代来设学。”<sup>②</sup>无论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抑或后人善意的附会,仅仅从字面上就不难感受附着于六朝松之上悠久的历史感。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园中可以与六朝松相媲美的还有梅庵。陈训慈对于梅庵的来源也进行过一番考证:

只是现在东南大学校舍中有一个名称,还保留着两江的一位人物的影子。两江的最后监督李瑞清,就是长于写字的“清道人”,有时题着“清道人阿梅”,是因为他的号叫做梅庵。据说他作监督时,也不停的在一字房楼上挥笔。高师创立以后,江校长易园因

①佚名.插图[Z].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11-01,第1卷第2期.

②陈叔谅.东南大学的渊源与沿革[Z].学生,1924-09-05,第11卷第9号.

为他和两江关系很久，便篆著“呆龛”二字，做校园中小屋的名称。我们后进的学生们，也便不问来由的以“梅庵”二字当做校园的名称，这“梅庵”二字倒可与东南大学终古了！<sup>①</sup>

从学子们普遍用梅庵来代称东南大学，就不难感受东南大学校园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背景对于学生们的濡染和熏陶。1922年，该校一位学子更是用生动形象的笔触向外界描绘和勾勒出一幅完整立体的学校校景图：

这两面一体的学校，位置在北极阁之下，旁有鸡鸣寺，古台城；东望钟阜，双峰插云，而烟雨不时，使生活在这伟大而优美的自然环境的千百男女学生，得着丰厚的人生意趣。学校里有一个梅庵，拓地虽不广，然布置得疏密恰当，用两句俗语来形容他：“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春之景。”并有一棵道貌渊然的六朝松，起人不少缅怀往昔的遐思。<sup>②</sup>

其实无论是注重校址的自然风光，还是珍视校址所蕴含的历史底蕴，办学对于校址的重视根本上是着眼于其文化价值，即重视校景对于学生人格的陶冶与熏染，重视大学接续人文历史与光大文化传统。

天然优美的校景对于学生能够起到潜移默化的陶冶功用。正如蔡元培所言：“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sup>③</sup>在他看来，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追求道德的不断向上发展和进步，而辅助道德发展则无外乎智育和美育两种途径，而美育的最终着眼点恰好在于陶冶人格和熏陶情感。

1935年，国民政府曾动议将国立中央大学迁离原址，另于南京市郊辟地新建。时任中央大学地理学系教授的张其昀专门行文予以反驳。而其力主不迁校的原因正是在于“历史背景尤为大学无价之宝”：

况且历史背景尤为大学无价之宝。此校为明代国子监的旧址，是五百年前国立大学的所在，永乐迁都以后，南监依然存在。诗人吴梅村曾充最后一任的祭酒，至清兵南下，学生始星散，故吴梅村诗有“弦

管消沉”“极目萧条”之语。嘉庆间的火灾，把前明国学全毁，但成贤街之名尚保存至今。清末两江师范的旧事，姑且不提，即就四年以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艰难缔造的历史，究竟也含有相当的价值。<sup>④</sup>

“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数千百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广大国粹的心思。”<sup>⑤</sup>作为高等教育与文化学术机构，大学在阐扬民族传统，光大固有文化方面更是具有难以推卸的责任。1924年，陈训慈曾于考证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址历史时，对于东南大学有幸能够接续前代学术文化传统赞赏有加：“不过一个事业的价值，本不在于表象浸润于明代的学风文化无形的传沿到今——这不是南监的最大成效么？何况，五百多年后，地灵诱致着一个新的学校，建设在他的残迹之上，到现在好容易长出一个东南大学来！形迹是完全不同了，可是我们还依然维护着一个大学和五百年前的先驱，隐相衔接呢！”<sup>⑥</sup>

### 三、“教育贵乎薰习，风气赖于浸染”

曾有学者将大学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喻为大学校园中“永恒的风景”：“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永恒的风景’。构成这道‘风景’的，除了眼见为实、可以言之凿凿的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科研成果、名师高徒外，还有必须心领神会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精神。”<sup>⑦</sup>其实，无论是历史传统，抑或文化精神，都属于大学精神。作为大学校园文化的精神表现形态，大学精神是大学校园文化的灵魂与核心。它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大学校园中，由师生日常生活方式直接表征的核心价值观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氛围。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时期的大学精神从源头发生、外在表征再到形成传统，具有自身特有的内在逻辑：大学校长及其确立的校园核心价值观为精神源头，优美成熟的校风为精神表征，民主和科学作为内核的精神传统。

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日后成为著名记者与作家的曹聚仁曾这样评价一师校长经亨颐：“‘一师’

①陈叔谅. 东南大学的渊源与沿革[Z]. 学生, 1924-10-05, 第11卷第10号.

②陈叔谅. 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学生生活[Z]. 学生, 1922-07-05, 第9卷第7号.

③张其昀. 中央大学迁校问题[Z]. 独立评论, 1935-10-13, 第172号.

④陈叔谅. 东南大学的渊源与沿革[Z]. 学生, 1924-09-05, 第11卷第9号.

先后,有过许多校长,可是,我们说到‘我们的校长’,只是指经子渊(亨颐)先生而言,跟其他校长毫无关系。”<sup>[9]</sup>对于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而言,郭秉文也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被学子们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校长”。因为正是郭秉文自身的高尚人格以及其所坚持的办学宗旨,才为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大学精神的生成发育植入了最初的基因。

正如中大学子日后对其所做的极高评价:“国立中央大学之基础,实奠定于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之时;而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之规模,实建立于先生之手。凡我同窗,霖恩霑化,固无不仰望先生,如泰山,如北斗也。”<sup>[2](p160)]</sup>郭秉文之所以受到师生们的高度赞誉,与其高尚的人格与严格遵循教育规律办学和育人密不可分。曾有东南大学学子这样回忆校长郭秉文:“出则戴黑礼帽,乘旧马车,正襟危坐,志念深沉,每值生徒,则高举其帽,微笑示意;见之者,则伫立答礼候其去。斯诚君子之风,足以表率群伦者。”<sup>[2](p165)]</sup>凑巧的是,顾颉刚和潘菽在北大校长蔡元培身上也曾亲炙类似的平易近人。时就读于北大预科、日后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曾如此回忆蔡校长:“他天天坐着马车到校,看门的校警看见车子来了,站到门前立正行敬礼,照例校长是昂首直入的,想不到这位新校长竟脱下铜盆帽,向校警回鞠了一躬。这使得满脑子装着封建思想的学生奇怪起来,觉得他有失上下之礼!就在这样有意识地改造环境之下,渐渐养成了全校平等的气氛,使得教职员、学生、校工们无形中趋于亲密团结。”<sup>[10]</sup>毕业于北大、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心理学奠基人的潘菽,也正是感召于蔡校长的高尚人格才决定报考北大:“(我的大哥)听到我要去投考北大时,便写信告诉我说,以后的北大校长将是蔡先生,并且告诉我蔡先生的为人,说他常是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并且有时还自己淘米。我听到这个消息,很庆幸自己没有选错了路。这是我在心中深深景仰蔡先生的开始。”<sup>[11]</sup>无独有偶,曾任教于东南大学、日后成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人的胡先骕就曾将郭秉文与蔡元培相提并论:“统观今日之大学校长,自蔡子民以下,能胜郭氏者又有几人乎”。<sup>①</sup>由此不难感受作为校长的郭秉文人格之高尚。

郭秉文以身作则地示范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学子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来开展办学实践活动,其为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奠定了“三育并举”的独特人才培养理念。具体到校园文化建设,就是开始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重建注重发扬师生合作精神、注重培植学生自治能力的学生训育制度<sup>[12](p92-101)]</sup>。正是在郭秉文的主持下,极具现代性的学生自治会成立于南京高师。而在成立学生自治会的同时,郭秉文还聘请留美归来、熟谙学生自治内涵的刘伯明、陶行知、陈鹤琴和廖世承等教师负责主持第一届学生自治委员会。正是由于教师委员指导有方,再加之师生合作无间,使得东南大学学生自治会成为五四时期各项工作开展较好的高校学生自治会之一。<sup>[13](p91)]</sup>

郭秉文在为学校奠定了核心价值观之后,便注重通过全校师生的通力合作来对其加以普及和推广,入手的途径正是师生的整体生活方式。正是在校园生活方式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上述核心价值观才有可能被潜移默化地嵌入,在同化为师生整体的深层心理结构的同时,凝聚形成为能够代表一校整体精神风貌的校风。“校风者即学校精神之现象也。”<sup>[14]</sup>正是在郭秉文的掌校过程中,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形成了自身所特有的“精神现象”——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风。

教育贵乎薰习,风气赖于浸染。刘伯明先生经庶者出身于教会,寝馈于哲学,……先生引为副贰,校内事一以付之。薰习所及,浸染渐深,遂成为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朴质勤敏之学风。非先生之知人善任,曷克臻此耶?<sup>[2](p161)]</sup>

给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学子留下深刻印象的刘伯明先生,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其不仅人格高尚,而且学识渊博。由于郭秉文忙于校外事务,因此他成为学校实际的主持者,对于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风的影响至深至远,甚至其着装打扮都成为当时南京高师学子纷纷效仿的对象。曾就读于南京高师、日后成为著名近代史学家的郭廷以十分清楚地记得,时任南京高师校长办公处副主任的刘伯明先生,“平常头发垂过前额,几乎盖过半个眼睛,学生们就模仿起来,他的言行无形中影响了全校,而成

①胡先骕:《东南大学与政党》[Z],《东南论衡》,1925,第1卷第1期。

为全校的精神重镇。”<sup>[15]</sup>由此可见南京高师学生对其的推崇和爱戴。郭秉文的知人善任对于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风的形成至关重要。正是由于一系列在人格与学识方面俱佳的教师以身作则，躬亲示范，才为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顾颉刚曾指出，维持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的根本在于“民族精神”<sup>[16]</sup>。大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大学之所以得以维系和传承，正是由于大学精神的绵延不断。大学精神代表和构成了大学的文化传统。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郭秉文校长功不可没。“在南高时期，他协助江谦校长制定了‘诚’之校训。在东南大学，他又提出‘止于至善’的校训。持诚至善，贯之以恒，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朴实、勤奋的南高一东大学风和以科学精神、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精神。”<sup>[12](p163)</sup>南高一东大精神一经形成就相对稳定，并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一届届的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学子。尽管东南大学于1927年便不复存在，但是其所形成的大学精神却直接为后继者中央大学所继承：“国立中央大学，前身为国立南京高等师范与国立东南大学，学校名称，虽有改变，而其精神，则为一脉相承。”<sup>[2](p165)</sup>

#### 四、“学生与教职员之情谊亦非疏通不可”

早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期间，郭秉文就十分留心学生自治之于学生身心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他在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这样论述师生合作基础上的学生自治的意义：

余则养成学生自治与守秩序习惯诸美德之学校组织，尤当变今之道而提倡之。故今而后最当注意者，为学校全体共作之精神，非限于校长与教员之联络，而学生与教职员之情谊亦非疏通不可。若遇机缘，有几种自治团体使学生分任一部分关于整理学校秩序之事，所宜输入者也。……欲自治制度之有成效，必赖一部分学校行政者之承认，且为各学生能力所及之事，夫教职员确知自己管理权之界限，而学生又能敬守学校行政者之法权，二者交相让，则学生

自治之事进行，其庶几乎？<sup>[2](p39)</sup>

值得注意的是，郭秉文并非一味地为学生自治争取无限制的权力，他反而将“学生与教职员之情谊亦非疏通不可”视为“而后最当注意者”，“欲自治制度之有成效，必赖一部分学校行政者之承认”。在他看来，理想的学生自治理应是师生合作与学生自治的完美调和，而这恰恰是由大学特有的组织特性所决定：“大学校园文化既是一种教育环境，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环境。……教育环境明确地规定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地位任务，而文化环境中更重视两者间的群体关系、双向影响。”<sup>[17]</sup>纵观郭秉文时期的办学实践，师生合作基础上的学生自治不仅成为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校园的基本生活方式，也成为其特色鲜明的育人理念与模式。

师生合作的前提在于师生人格之平等，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师生之间在彼此尊重人格和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共同合作的意识，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基本行为方式。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成立和运行固然最能代表和体现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的师生合作与学生自治完美融合的理念。当时校园内所形成的其他极富特色的生活方式，同样很能说明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师生合作无间与学生高度自治之成效。

先生诲训学生，首重品德。高等师范，系以培养经师而兼人师。为求达“教育即生活”之目的，而其着手，则又在衣食住行之中，住则六人一室，早晚自修，安静异常；衣着简朴，不尚华丽；饭厅之中，每晨早餐，事前备有甚多之面点，学生鱼贯而进，各取食品，遂以所值，投钱入预置之木盒中，虽无备工管理，餐毕，总其所得，从无短少，吾读东南大学时，仍袭此制，“中大”亦然。此种自觉，自治之风尚，后虽任教数十年，未之一见<sup>[2](p165)</sup>。

仅从“吾读东大时，仍袭此制，中大亦然”一句，就不难体会师生合作与学生自治已然成为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所共有的文化传统，而蕴含其中的高度自律和守持意识更是对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精神之内核——“诚”的高度彰显，由此可见大学精神之于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学子影响之深刻。

基于师生合作的学生自治也鲜明地体现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各类学生社团的发起办理与实

际运行中。为了推动学术研究,东南大学各科纷纷以教师指导、学生创办的方式,组建了许多学术社团,而且均由师生共同参与<sup>[13](p158)</sup>。虽然许多刊物都是以学生名义举办,但是丝毫不影响刊物的学术质量。学生在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反而发表了许多颇具学术含量的高水平研究论文。这种独特的育人方式也成为当时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园文化和人才培养的一大亮点与特色。

1920年考入南京高师、日后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郑鹤声就是此种生活方式的受益者:“《史地学报》及《史学与地学》中所刊文章,大体而言,皆是课程作业中的优良作品。就我个人而论,1925年我作毕业论文时,柳先生拟出“汉隋间之史学”一题……,柳先生评阅后,作“一时无两”的评语,写于论文卷首,推荐《学衡》杂志发表。后从《学衡》上抽印成为《汉隋间之史学》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sup>[18]</sup>。郑鹤年所提及的柳先生正是任教于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著名文史专家柳诒徵。1918年考入南京高师、日后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开创者的严济慈,在大学高年级即成为由科学社主办的《科学》杂志的编外编辑,协助教师胡刚复初审稿件,此种经历使得严济慈自谓“从中受益匪浅”<sup>[19]</sup>。1917年考入南京高师农业专修科、日后成为我国水稻螟虫防治研究先驱的邹钟琳,在校读书期间就潜心研究植物真菌病,后经教师邹秉文推荐,研究成果同样发表于《科学》杂志<sup>[20]</sup>。

## 五、“它仿佛可和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相比”

1920年考入南京高师、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吴俊升曾这样生动地形容南京高师卓越的育人影响与实绩:“南京高师不仅完成了训练师资的使命,它还尽了孕育文化和造就学术界与事业界各种人才的责任,在这一方面,它仿佛可和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相比。”<sup>[12](p4)</sup>在他看来,南京高师在作育人材方面几乎可以与曾经培养出诸如罗曼·罗兰、萨特、巴斯德以及福柯等科学与人文艺术大师的巴黎高师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其对于南京高师育人成绩

之满意。而在张其昀看来,南京高师的人才培养水准几乎可以与当时的欧美大学相比肩:“南京高师毕业生留学外国的很多,外国的教授们,常常说南京高师学生的科学程度,可以同欧美大学同年级的学生程度相比,这的确是南京高师最有荣誉的教育成绩。”<sup>①</sup>

其实,并非身为南京高师人的吴俊升与张其昀不切实际的偏爱母校。据后来研究者统计,在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毕业生中,日后有十二位被遴选为新中国的中科院院士。除此之外,农业昆虫学家邹钟琳、体育学家夏翔、语言学家吕叔湘、历史学家郭廷以、历史学家向达、地理学家胡焕庸、地理学家张其昀以及历史学家陈训慈等等也均出自于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园<sup>[13](p236-237)</sup>。如果联想到由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三校合组,在办学不到九年时间里,共培养出7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1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二人为双院士)<sup>[21]</sup>,就不难体会,对于一个办学时间仅有十三年的高校而言,能有如此的育人成绩实属难能可贵,由此也不难感受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在育人方面的特色与影响。

简而言之,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园文化的根本价值,正是在于培养出一大批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优秀人才。由于郭秉文对于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高度重视,并坚持将其贯穿于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始终,并努力形成各类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生活,最终为其发挥积极的育人影响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南京高师和东南大学的办学时间并不悠久,但是育人始终被郭秉文置于办学实践的首要位置。也正是由于他认识到“学生之课外作业”在育人方面所特有的价值,因此才积极创设和推展各类校园活动。无论是学生自治组织的创办,还是学生社团和学术刊物的办理,学生们正是在此种学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积极互动与交流中,培育了大学自身的精神文化氛围,在无形中提升了学术研究能力,潜移默化地陶冶了人格情操。

## 参考文献

- [1] 舒新城.中国新教育概况[M].上海:中华书局,1928.

①张其昀.我所希望于本校同学者[Z].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12-01,第1卷第4期.

- [2] 东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郭秉文与东南大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
- [3] 左惟,等.大学之道——东南大学的一个世纪[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181.
- [4] 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8.
- [5] 周勇.江南名校的中国文化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总序2.
- [6] 张汝伦.文化融合与道德教化——蔡元培文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376.
- [7] 陶行知.行知书信集[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1.
- [8] 陈平原,夏晓红.北大旧事[G].北京:三联书店,1998:代序1.
- [9]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07.
- [10] 顾颉刚.顾颉刚自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55.
- [1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潘菽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116.
- [12] 冒荣.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 [13] 张雪蓉.美国影响与中国大学变革(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研究中心[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6.
- [14] 《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1896~1927(第一卷)[Z].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235.
- [15] 郭廷以.郭廷以口述自传[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86.
- [16]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扉页.
- [17] 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88.
- [18] 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03-104.
- [19] 王大明.试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声望问题[J].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6):36-42.
- [20] 张剑.中国科学社的科学宣传及其影响(1914-1937)[J].档案与史学,1998(5):44-51.
- [21] 清华大学新闻网.西南联大建校65年培养两院院士90名[EB].[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s/4205/2011/20110225231319406382201/20110225231319406382201\\_.html](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news/4205/2011/20110225231319406382201/20110225231319406382201_.html),2002-11-14.

## The Shape and Function of the Campus Culture in Nanjing Higher Normal School and National Southeast University in GUO Bing-wen Period

LI Li

**Abstract:** As well-known universiti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Nanjing Higher Normal School and National Southeast University have formed a very unique campus culture in thirteen years, had significant education impact and traine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talents. These achievements were benefited the principal GUO Bing-wen who focused on cultivating people and fostering a kind of cultural life. Principal GUO emphasized cultivating and nurturing students by forming excellent campus culture, paid attention to developing stud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and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by the reconstruction of student lifestyle. The campus culture of Nanjing Higher Normal School and National Southeast University was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spiritual products and lifestyle created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university spirit is the soul. Student government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among teachers and students is the carrier of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Principal Guo always thought about the position and orientation of campus culture in the South and East high school practice by standing on the height of cultivating good citizenship for democratic society, building a kind of university culture and spiritual atmosphere valued academic research, and making university lead society.

**Key words:** Nanjing Higher Normal School; National Southeast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e; student lif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责任编辑 李震声)